

元代欧洲旅行家笔下的杭州及其影响

——杭州在西方人眼中的最初印象

徐海松,张玲蓉

(杭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巴黎诺里是最早来杭州游历并向欧洲介绍杭州的三位欧洲旅行家。他们在《游记》中描述了 14 世纪中叶之前的杭州城市风貌,这是迄今所知西方人勾勒的最初的杭州印象。明清欧人对杭州的报道是马可·波罗时代的继续,元代旅行家对杭州的描述,启迪了明清欧人更为客观、全面地揭示杭州

关键词: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杭州

中图分类号: G125.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2146(2000)05- 0061- 05

在 13 世纪至 14 世纪中叶的元朝统治时期,曾有四位著名的西方旅行家先后亲临杭州游历,他们是被西方学者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当中的三位: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 1324,意大利人)、鄂多立克 (Odoric, 约 1286- 1331,意大利人)、伊本·白图泰 (Ibn Battuta, 1304- 1377,摩洛哥人),加上元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 (Giovanni dei Marignolli, 生卒不详, 1342- 1346 年在华)。其中,除伊本·白图泰是来自非洲的旅行家之外,其余三位均为欧洲人,他们都在游记中留下了对杭州风物民情的观感。这是迄今所知有文献可考的西方人对杭州的最初印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记载还成为 16- 17 世纪来华欧洲传教士们深入考察中国国情的参照和启迪,某些内容还成为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对象。本文试以“西方人怎样开始认识和了解杭州”这一角度,去追寻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东方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

一 元代三位欧人的杭州之旅与东行《游记》

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空前疆域为中外交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元朝政府鼓励各国商人来华经商,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使元朝成为中外关系发展史上的极盛时代。随

着欧洲商人、使臣和传教士的纷纷来华与中国人首次出使欧洲诸国和罗马教廷,中欧文化交流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刚刚充当过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宋故都杭州,就在此时被首次介绍到了欧洲,而为欧洲人最早描绘“杭州形象”的文化使者,正是元代来杭州游历的三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因此,这三位欧洲旅行家的杭州之旅及其所撰游记的背景情况,将是我们首先关注的。

总结中外学者对马可·波罗生平的研究成果,可知马可于 1271 年随其父、叔从故乡威尼斯出发前来中国,1275 年到达元朝上都,至 1291 年初离开泉州港,侨居元朝达 17 年。他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并由狱友鲁思梯切诺笔录完成《游记》一书是在 1298 年。^[1](P356)同时,笔者也赞同学术界比较一致的一些结论,比如说马可·波罗是一位商人的儿子,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汉语;《游记》记述的一些内容确实存在过分夸张和失实之处。

[1][2](PP337- 37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旨不是为了寻找新的证据来讨论马可·波罗是否来过杭州,而是以马可入华及其游历杭州的真实性作为论述的前提^①。据马可自述,他曾多次来过杭州:“马可波罗阁下数至此城,曾留心其城之事,以其见闻,笔之

*收稿日期: 2000- 06- 27

作者简介: 徐海松 (1962-),男,浙江富阳人,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张玲蓉 (1963-),女,上海人,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浙江大学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与旅游文化研究。

于书。”[3](P335)而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是:“马可对杭州的描述详细而准确,大部分可以在汉文史料中得到印证”,如以《游记》所述杭州盐课为例,考证《元史·食货志》所记两浙盐课总额“与波罗所说基本相符”。^②需指出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杭州的记载,因所据版本不同而略有出入,今以冯译本[3]和陈译本[4]流通较广。

另一位来杭州游历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生平事迹仅见于他口述的《东游录》:他年轻时就矢志效忠于天主教方济各会,喜欢过清苦的托钵僧生活,1318年开始东游,1321年抵达西印度,并由此经海道到达辛迦兰(Censcalan),即中国的广州。约1322—1328年间,他在中国旅行,到过刺桐(今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府(今南京)、扬州、明州(今宁波)、汴八里(今北京)、甘肃等地。后返回故国,死于1331年1月。《东游录》是他晚年应地方官之请,在病中口述,由他人笔录而成的。故有不少地方含混其辞,难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旅行路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鄂多立克走的是海路,回去走的是陆路,正好与马可·波罗相反。据英国学者玉尔(H. Yule)等人研究,鄂多立克是从广州至泉州、福州,经闽浙赣三省交界之仙霞岭,来到杭州的。[5](PP27—30)与中世纪其他旅行家一样,《东游记》也有夸大失实之处,但也留下一些独具参考价值的记录,有关杭州的记载即是其中之一。

元代第三位来杭州游历的马黎诺里,也是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不过,他是奉罗马教皇之命出使中国的。1336年六月,元顺帝派遣以拂郎人(Frank,元人借用波斯语对欧洲人的称呼)安德烈为首的使团出使欧洲。1338年,使团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拜谒了罗马教皇,受到款待,并得以游历欧洲。同时,教皇决定派遣使团回访。马黎诺里作为回访使团成员之一,于1338年底启程来华,1342年8月抵达上都,谒见元顺帝,进呈教皇复书并献欧洲良马(时称“天马”)。使团在留居大都约三、四年之后,于1346年获准南下泉州,由海道返国。[6](P288)按玉尔推算,马黎诺里约在1347年底离开中国。[7](P290)据此,马黎诺里游历杭州应在1346—1347年间。1353年,马黎诺里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复命。次年,他应教皇之命到布拉格主持修订波希米亚编年史,他在书中插入了自己的东使游记,这便是后人所称的《马黎诺里游记》。该游记于1768年始由多布内(C. Dobner)将其刊于《波希米亚历史文献》中,1820年德国人梅纳特(J. G. Meinert)始将《马黎诺里游记》单独辑出,重加整理,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会报》。亨利·玉

尔又对游记作了英文译注,收入其《中国及通往中国之路》第3卷中。[8](PP210—269)我国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张星烺在1928年发表了《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一文,[9]辑录元人7种文集史料中有关马黎诺里进献“天马”的记载,明确证实了马黎诺里使团抵华之事实。

在元朝统治的六、七十年间,先后有三位意大利人远涉重洋,游历杭州,并且都为欧洲人留下了有关杭州城市风貌的记录,这对研究杭州对外交流史与城市发展史无疑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史料。

二 元代欧人笔下的杭州风情

尽管三部游记对杭州的描述各有详略和侧重,但作为第一批考察杭州的欧洲人,一致赞美杭州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城市。如马可·波罗称为“天城”或“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3](P350)鄂多立克称为“天堂之城”,并说“它是世上所有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5](PP67—68)马黎诺里则称杭州为“最有名之城”,即“最美丽、最伟大、最富裕、人口最稠密,总之最为奇特之城”。[10]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1347年到杭州游历的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在他的游记中称赞杭州是“在中国所见到的最大的城市”。[11](P556)综合三位欧人对杭州的观感,他们几乎涉略到14世纪之前杭州风貌的各大方面,其中受到特别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关于杭州的外语名称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北部中国为“契丹”,南部中国为“蛮子”。三位欧人都称杭州为蛮子国的都城^③,但对杭州的译写各有不同。因马可不懂汉语,故《游记》中对杭州的称呼是以他在华期间最为熟练的波斯语和蒙古语译称的。据冯先生考证,在各种《游记》版本中,对杭州有种种不同的拼写法:如“Quinsay”、“Quinsai”、“Quiensay”、“Chisai”、“Chesa”等。冯先生认为后三种写法似是传写之误,而“Quinsay”一词,应为“京师”或“行在”之对音,故冯译本采纳后者,[3](P353)陈译本则采用前者。[4](P175)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将杭州译写为“Cansay”、[5](P67)“Campsay”、“Chansay”等。冯

① 关于马可·波罗杭州之旅及其见闻的真实性问题,国内学者的论文主要有:向达《元代马哥·李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东方杂志》1929年5月第26卷第10号;唐锡仁《马可·波罗杭州纪游》,《地理知识》1980年第6期;沙舟《马可·波罗所见杭州初考》,《未定稿》1986年第7期。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② 见前揭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

③ 蛮子,“Man z”是蒙古人采用的对中国南方的旧称。

先生认为从鄂多立克将扬州译为“ Iamsay”来看,“ Cansay”亦可对音杭州,他还提出一条佐证:“宋以来杭州方言读杭州 ang ts é”。 [3](P353)如果冯说成立,则鄂多立克乃是第一位直接以汉语读音拼写杭州地名的欧洲旅行家。马黎诺里在《游记》中,译称杭州为“ Campsay”。向达先生将该词译为“行在”, [10]而郝镇华先生译为“康勃绥(杭州)”。 [7](P289)

2 杭州的城市规模和地理环境 三位欧人对杭州的赞美都以“最大”或“人口最稠密”来形容元代杭州城市规模之大。马可·波罗说:“据共同之说,此城周围有百哩,道路河渠颇宽展”,“城之位置,一面有一甘水湖(笔者按:指西湖),水极澄清,一面有一甚大河流(按:指钱塘江)。河流之水流入不少河渠,河渠大小不一,流经城内诸坊,排除一切污秽,然后注入湖中,其水然后流向海洋,由是空气甚洁。” [3](P355)令人惊讶的是,距今 700 多年前的马可·波罗就已经关注到杭州的污水和空气等环境质量问题

此外,马可还首次向欧人描绘了西湖风光:“城中有一大湖,周围广有三十哩,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湖中有两岛,各有宫一所,宫内有分建之殿甚众……此外湖上有大小船只甚众,以供游乐。” [3](P350-358)

鄂多立克记录的杭州:“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十或十二间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还多。城开十二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伸延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为大”,“此城位于静水的礁石上,象威尼斯一样有运河。” [5](P67)可见,鄂多立克对杭州城郊的人口之多和面积之大印象深刻。

马黎诺里也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并且形容杭州“市容壮观华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7](P289)

3 杭州的交通、市政和生活设施 马可说“(杭州城)内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多,不足为异,盖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因此遂建多桥以通往来。” [3](P355)鄂多立克记述杭州:“它有一万二千多座桥,每桥都驻有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 [5](P67)马黎诺里也注意到杭州的石桥:“昔日有作者写道:杭州有一万座精美石桥,石上有各种雕刻的持械王公像。未亲临其境者难以置信。不过也许皆非谎言。” [7](P289)关于欧人所记杭州石桥数量是否失实,冯承钧先生解释:“此万数为数之极……

盖言其多,未必确有万桥也” [3](P354)

此外马可·波罗还注意到杭州城内的街道路况、公共浴室、夜间灯火管制、火灾和治安报警系统等市政和生活保障设施。 [3](P39-390)

4 杭州的工商经济和封建赋税 作为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对杭州的城市工商业情况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敏感。有关内容在《游记》专述杭州的一章中占了较多篇幅,如他叙述道:“书中并言此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诸人皆勤于作业,盖其地有不少城市,皆依此城供给也。此书又言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 [3](P350)又说:“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 [3](P356)可见元代杭州的工商经济相当发达

马可所记元代杭州地区的“盐课”等赋税征收情况,也具有可信的史料价值。中国学者已经考明,马可所记盐课数目基本属实。 [3](P365) [2](P348)鄂多立克同样关注杭州的赋税制度。他记录道:当时每火(10或12户)每年缴纳的税额,相当于“五张象丝绸一样的纸币”,征收对象除“撒刺逊人(指伊斯兰信徒)”外,还有“基督徒、商人的和其他仅从该地过路者。” [5](P68)

5 杭州的市民风俗 马可·波罗以一个欧洲人的眼光观察,记录了元代杭州的市井民俗。《游记》载录的杭城民间风俗主要包括:生育、丧葬、交际、饮食、服饰,甚至还记录了娼妓、占卜迷信等陋习。 [3](P352-359)鄂多立克则带着“那么多人怎么能安排住在一个地方”这一疑问,考察了当时杭州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他发现:“那里(指杭州)始终有大量的面食和猪肉,米和酒,酒又称为米酿(bigni),享有盛名;那儿确实有大量其他种种食物。” [5](P68)

6 杭州的宗教 由于三位旅行家均来自宗教势力强大的意大利,其中二位又是肩负宗教使命的传教士,因此他们对杭州的宗教活动自然特别关注。马可描述西湖周围“偶像教徒之庙宇(注:指佛教寺院)甚多”, [3](P351)又说杭州城内有一座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堂。 [3](P352)

鄂多立克自述他在杭州遇到过四名天主教徒,而且“在他家里受到款待”,某一天又在他陪同下拜访了“该地百姓的一座大寺庙”,并描述道:“此园中原有座小山,覆盖着可爱的树木,而且到处都是岩窟”,小山上还有猿、猴等各种动物。 [5](P68-69)显然,这就是杭州人熟悉的灵隐寺内的

“飞来峰”、“呼猿洞”等景观,这在南宋《乾道临安志》[12]与明代《西湖游览志》[13]中均可得到印证。马黎诺里除了提到了灵隐寺内的猴子等“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之外,还注意到杭州的庙宇“往往有一、两千僧人共同生活。”[7](P289-291)

三位元代欧人笔下的杭州风貌,除了上述之外还涉及杭州的皇宫遗址[3](P352-360-361)[5](P68)、驻防军队[4](P351-352)、户籍管理[3](P352)、旅游活动[3](358-359)等。总之,通过三位欧洲旅行家的《游记》,杭州在欧洲人心目中构建起了它的第一个印象。

三 明清欧人对元代旅行家首次报道杭州的反应

《马可·波罗游记》所勾勒的中国形象,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游记》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游记》描述的东方之富丽,强烈地刺激了欧洲王公贵族们的贪婪之欲,成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开辟新航路,进而导致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之一。被马可·波罗形容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天城”的杭州,无疑是欧洲航海探险家们向往的东方宝地之一。

英国学者赫德逊在其名著《欧洲与中国》(首版于1931年伦敦)中揭示,哥伦布的远航计划,实际上是接受了天文学家托斯卡内利提出的由欧洲西航到达中国的方案(此方案是在托斯卡内利于1474年6月给葡萄牙廷臣马丁斯的信中透露的,哥伦布拥有该信的抄本)。在这封信中,托斯卡内利援引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中国及其沿海岛屿的情况,尤其是有关杭州的繁华景象的描述,并且在信中说:“从里斯本城直接向西航行,到达最宏伟巨大的城市杭州……这个距离约为绕地球一周。”[14](P180-187)赫德逊揭示这封信的意义在于,尽管学术界对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地存在争议(即便认为杭州不是他的探险目标),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种推理:《马可·波罗游记》有关杭州的描述是促使哥伦布远航探险的动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15世纪欧洲航海家们的目标指南,而且也是16世纪后入华欧洲传教士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基础,并为他们向欧洲人重塑中国形象提供了启迪。

随着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1565)、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1569)、西班牙人德·拉达(Martin de Rada)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1585年被后述门多萨的著作所引用)、门多

萨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等著作的问世,16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生活和风俗的了解无论在量和质上都大为增加。在这些著作中,尽管他们丰富、修正了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报道中存在的一些缺漏与失误,但是专门介绍杭州的内容却远远少于元代欧人,甚至错解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描述。

例如,到过中国福州等地,并肯定读过马可《游记》的拉达,却把马可指称为“行在”和译为“天城”的杭州错当作北京。[15](P191)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拉达的这一错误竟被后来风行欧洲的门多萨《中国大帝国史》因袭。[16](P25)这不能不说是杭州走向欧洲的一个曲折。

关于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作品中,相比马可·波罗时代,为何出现忽视甚至曲解杭州?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限于本文的中心论题,笔者只能略述二点:其一是因杭州在全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了;其二是因16世纪的中欧直接交往还刚刚起步,当时还没有一位像马可·波罗那样能在中国留居十多年的欧洲人。

明清欧人对杭州的深入考察与正面报道,是从耶稣会士入华以后才真正开始的。1583年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 Ricci),称马可·波罗是一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17](P4)正是这位开辟中西文化交流新纪元与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以其亲身经历向欧洲人证实了《马可·波罗游记》所说的契丹(Cathay)就是中国。[18](P382)继利氏之后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为西方所作的中国报道具有两大鲜明特点:其一是以亲身见闻和实地考察报告作为第一手写作材料;其二是以丰富的中文资料和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前者可以说是对马可·波罗的继承,后者则是明清传教士独具的优势,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西方文化修养和汉语文字运用能力的耶稣会士。

清初曾在杭州传教多年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 Martini),在欧洲出版的著作《鞑靼战纪》(1654)与《中国新地图志》(1655)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鞑靼战纪》主要记载了清兵入关后与南明的战争,但该书开头是以马可·波罗(此书中译称“保罗·威尼斯”)在《游记》中提到的中国与鞑靼人之间的那场战争开始的。[19](P3)但是,卫匡国在著作中也特别指出:“关于这座城市(即指杭州)的美丽、繁荣和富足我想在别的地方叙述。这些都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我在那里居住三年时间中所见,以及我从那儿回欧洲时目睹的。”[19](P36)

显然,卫匡国已经明确意识到,他对杭州的叙述,必定要站在马可·波罗的基础之上。

尼·斯·米列斯库(N. S. Milescu,或译斯帕法里)编著的《中国漫记》是 17世纪介绍中国最为详细的作品之一,但有学者认为它大量抄录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的内容。不过,笔者细读该书第四十五章有关杭州的介绍,深感这是一篇全面仿照《马可·波罗游记》描述杭州的体例,又援引多种资料,内容充实的“杭州指南”。其中,他特别强调马可·波罗所说的“京师”就是杭州,[6](P138)纠正了上述拉达·门多萨等人的错误。最后,他给杭州的评语是“这个城市之秀丽非笔墨所能形容”,言下之意是最好亲自到杭州来眼见为实。

关于明清欧人的杭州观,笔者将另文讨论。本文所要表明的是,明清欧人对杭州的报道是马可·波罗时代的继续,元代欧人《游记》对杭州形象的最初展示,启迪了明清欧人更为客观、全面地揭示杭州。

四 结语与余论

回顾杭州走向欧洲的早期历史,我们发现:最初架起杭州与欧洲沟通桥梁的角色,几乎都由欧洲人承担了。无论是处在杭州城市发展高峰期的宋末元初,还是处于发展相对平缓的明清之际,欧洲人始终充当了向世界展示杭州风貌的主角。平心而论,这种局面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平等原则不相称的。事实上,由欧洲人单方面勾勒的杭州形象,难免会因文化隔阂而造成误解和扭曲。历史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启迪:构建中外双方对等、互动的文化交流机制,乃是杭州主动走向世界的必由之途。

参考文献:

[1] 顾卫民. 中国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1874—1990) [A]. 中国文化书院.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2] 余世雄.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评述 [A]. 中国文化书院.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3]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4] 陈开俊, 等. 马可·波罗游记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5] 柯高济. 鄂多立克东游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 黄时鉴. 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7] 阿·克·穆尔, 郝镇华.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8] Henry Yule. Cathay and Way Thithe [M]. London, 1915.

[9] 张星 火良. 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 [J]. 史学与地学, 1929, (3).

[10] 向达. 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 [J]. 东方杂志, 1929, 26, (10).

[11] 冯金鹏. 伊本·白图泰游记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12] 周淙. 乾道《临安志》 [A]. 南宋临安两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3]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14] 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5] C. R. 博克舍.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6] 门多萨. 中华大帝国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7] 柯高济, 等.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8] 罗渔. 利玛窦书信集 [M]. 台北: 光启社, 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5.

[19]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Hangzhou Under the Pen of European Tourist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Hangzhou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XU Hai-song, ZHANG Ling-rong

(History Department,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Marco Polo, Odoric and Giovanni are the three European tourists who first came to Hangzhou and introduced the city to Europeans. In their memoirs of travel they described all the aspects of Hangzhou city before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14th century, and this is the first impression about Hangzhou made by western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ports of the city by Europeans are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rco Polo epoch. The delineation of Hangzhou done by tourists in the Yuan Dynasty initiated a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Hangzhou by Europea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European tourists; Marco Polo; Hangzhou

(责任编辑: 沈松华)